

紫荊 · 山緣

——余光中與青少年對談文學

■ 整理：洪燁



余光中是中、港、台的著名作家，他的文學作品對當代文學發展深具影響。2011年11月，余老師親臨突破青年村，出席「紫荊·山緣——余光中與青少年對談文學」座談會，與嘉賓主持人胡燕青女士及現場師生暢談讀書、寫作和文學。

余：余光中老師 胡：胡燕青女士 問：現場學生提問

時間分配了我

胡：台灣詩人陳義芝曾這樣說：「余光中是不需要推薦的，四方都在傳誦他的詩文。」我想這已經是對余老師最好的介紹了。余老師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中文系講座教授、聯合書院中文系系主任。他寫作產量很多，到目前為止，他已經寫了19本詩集、12本散文集和7本評論集。余老師，您寫作超過六十年，一直沒有放棄，產量那麼驚人，同時在不同的大學教學、做研究工作，並擔任行政人員，還經常應約到處接受訪問、演講。請問您是怎樣分配時間的呢？在這方面，您有甚麼話跟年輕人說？

余：我沒有甚麼辦法分配時間，是時間分配了我。因為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寫稿、讀書、翻譯、教書、接受訪問、評審等，身不由己。我並沒有甚麼遠見，能把明天的事情準備好就已經很滿意了。我舉個例子，現在出版物這麼多，香

港、台灣和大陸每年都出版幾萬冊新書，能把朋友送給你的書看完，你已經是一個聖人了。

胡：如果有一天，您很想讀書，又想寫作，但又有人打電話邀請您去接受訪問、去演講，那您會優先處理哪件事情呢？

余：我會把學校的事放在前面。比如說，我今年教書，我對這所學校、對這些學生有責任，我必須把這件事情做好，然後再去服務社會。我現在任職高雄中山大學，每星期三上午9時至12時是我的課，因此若要訪問我，或是做其他事情，我可以在星期四應約，但星期二必須回去，而星期三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

胡：在您年輕、剛開始寫作的時候，您在讀書、寫作和工作上的時間分配是不是都用同一原則？會不會說這個月我已經接了三次演講，就不再接了？

余：那個時候，我不是很有名，一個月差不多被邀請三次而已。現在一個月大約會有二十次，所以就要選擇一下。年輕時初做講師，我教的課都是生平第一次教，就需要備課。對教師來說，備課非常重要，因為你以前讀書不求甚解，欣然會心就可以了；做了老師以後，要教這門課，你就必須把它讀通，然後才能講得有道理、有趣味，這時備課就很重要。老師考學生一個學期只考幾次，學生考老師，堂堂考，你必須準備得很好。所以我的學問有一部分是從備課來的。

胡：備課跟讀書重疊了，那就好辦一點；一旦又備課、又讀書、又寫作、又要演講，一天四十八小時都不夠。如果要寫作的話，我們一定要靜下來才能寫，您有沒有這個空間呢？

余：寫作跟忙沒有太大關係，只要真正靈感來了，真正言之有物，真正不吐不快的時候，那會很快寫好。只要稍微休息一下，找個地方沒有人打攪，就可以了。

胡：其實不需要很好的條件，只要我們的心能夠靜下來，能夠有點空間，就可以寫作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言之有物，是嗎？

余：對。

中國文學的「大傳統」和「小傳統」

胡：余老師，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是很不容易的，是不是只憑着一腔熱血和一點點天分就足夠了呢？請問老師如何堅持寫作六十多年？有甚麼原則？有甚麼話要對喜歡寫作的年青人說？

余：能夠寫六十多年，我現在還繼續寫下去，這當然不是容易的。首先，你要有點修養，比如說你作為一個中國作家，那你要對兩種傳統略為熟悉，第一個是「大傳統」，就是從《詩經》以來的古典文學；第二個就是「小傳統」，即從五四以來的新文學。對我來說，文學修養還有另外一個來源，就是西洋文學，我自己就專攻的英、美文學。這些還不夠，因為這些只是學習的對象，你還要有生活，有生活經驗，然後把經驗寫成作品，所以這是個如何調和、如何選擇的問題。寫〈等你，在雨中〉一詩時，我還年青，寫這首詩純粹是無中生有，並不是生活經驗，那時我想跟姜白石較量一下，就寫出這個作品來。可是後來當我的生活經驗更多的時候，我就會寫比較厚重的東西，像是〈白玉苦瓜〉，《白玉苦瓜》應該是標誌我充分成熟的一本詩集。

胡：余老師剛剛說了中國的「大傳統」和「小傳統」，以及英、美文學。世間上有那麼多的好書，在您年輕的時候，有沒有一個周詳的讀書計劃？是拿到書就讀，還是一步一步有系統地讀？

余：可以說沒有甚麼系統，是憑興趣，興趣多了以後，見識就多了，也不管甚麼好書，或是不夠好的書，只是讀得比較有規矩。譬如說，我喜歡西洋古典音樂，開始的時候，有機會就會聽音樂會、演奏會，後來我到美國讀書，就去買唱片，根據音樂史發展來買，這就比較有規矩；我教英美文學，教英國詩，也根據發展史來教；我聽搖滾樂，也是看過搖滾樂發展史的。

胡：這些讀書的方法，都有各自的好處：憑興趣讀書，持久力較好；根據發展史來看，就能夠全面了解該領域。有志寫作的同學，應該記得余老師剛才提及的中國的大傳統、小傳統和外國的傳統，如果我們根據這三個傳統來讀，應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

散文中的「重工業」和「輕工業」

胡：余老師，我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作家、詩人和小說家的身份看起來較清晰，散文家的面貌總好像有點模糊，但其實散文家是很深入人心的，好像周作人、梁實秋、余秋雨、董橋，和老師您。請問老師，一個人要具備甚麼條件，才能把散文寫好呢？

余：正如你所說，詩人和小說家的身份比較明確，散文家夾在中間，好像比較模糊。因為我們看的是文體，凡不是詩的東西，大概就屬散文的範圍，因此散文既有實用的一面，也有創造的一面。實用的一面，像你寫一篇報告，寫一

封信，記一篇日記，這都是散文，每個人無論願不願意，每天都在寫散文，所以散文家好像並不那麼獨創，可是你能把散文寫得很好，要有意向；要寫得生動，節奏要非常婉轉或是鏗鏘；言之有物，有很切實的道理，就有理趣；有很深的感情，那就有情趣。在散文家裏面，梁實秋有情趣，錢鍾書較有理趣，周作人則既有情趣也有理趣。我寫散文，另外有個方向，梁實秋老師跟我說散文不要長，短就好了，最好千、百字。可是我想五四以來的散文都是短短的小品文，我偏偏要寫大品文，所以我就寫寫五六千字和七八千字的，我稱之為「重工業」，而小品文是「輕工業」。因此，我的散文向不同方向發展。

與青少年談詩、說散文

問：很多人都認為詩是一種很複雜的東西，因為在不同人的眼中，它可以有不同的解讀，我們作為一個寫詩的人，要不要為自己寫的詩負責呢？是別人認為這首詩要說的是甚麼就是甚麼，還是要很清楚地解釋自己想說的意思呢？

余：詩要寫得成功，應該就不要說明。最簡單的抒情詩，應該不需要說明，不過有些詩用了典故、用了時代背景、用了特殊文化，所以有時候加一些注解也可以。說詩容易說錯，讀詩也不容易讀準，因為詩是開放的。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到底是想表現晚唐的氣勢，還是有更廣闊的象徵呢？比如說你要畢業了，同學都要走啦，你也可以說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以示美好的事情就快要結束了，這詩有狹義的，也有廣義的，有歷史背景的，也有象徵的。詩本來就是開放的，有心人自己去體會，不能一概而論。



問：余老師在〈剪掉散文的辮子〉中說過，五四的時候我們的散文還不太成熟，但是會在現代詩和現代小說的誘導下漸漸成熟。那您覺得現今的散文有甚麼進步？有甚麼改變？

余：當時寫這篇〈剪掉散文的辮子〉時，我覺得中國散文從五四到那個時候，就分幾類，我不是很滿意——有的寫得太過感性，美其名為散文詩，其實沒甚麼內容，言之無物；有的則倒過來，清湯掛麪，寫得非常淺易，沒甚麼高潮，沒甚麼讓人記得的好句子，我稱之為「浣衣婦的散文」；另一種是「學者的散文」，術語不斷，外行人讀起來覺得沒甚麼味道。中國以前的詩論，不會長篇大論，是點到為止的詩話，很有趣味。當時我覺得應該發展現代散文，所以我提出「密度」、「彈性」、「質量」等散文特色。後來，現代散文倒過來影響現代小說，比如說現在的意識流小說，或者魔幻寫實作品等。這樣也就是說，當代散文比較不耐咀嚼，張愛玲的散文就有很多層次了，有點西化，有點舊小說的語言，也有她自己創造的語言。現在，比如說莫言的小說、白先勇的小說、余秋雨的散文，他們的文字愈來愈豐富，這都是現代散文推捧出來的。現代小說使用的語言根本就是跟從現代散文。我個人感覺現代好作家的文章寫得愈來愈好，可是一般大眾的中文是愈來愈差了。我們寫創作性的散文，會用上寫詩和寫小說的手法，創作性的散文應該享有更多的自由；而一般用的散文應該寫得平平實實，讓人家一看就懂，不會產生誤會。

